

琉球古代歌謡集《思草紙》的中琉关系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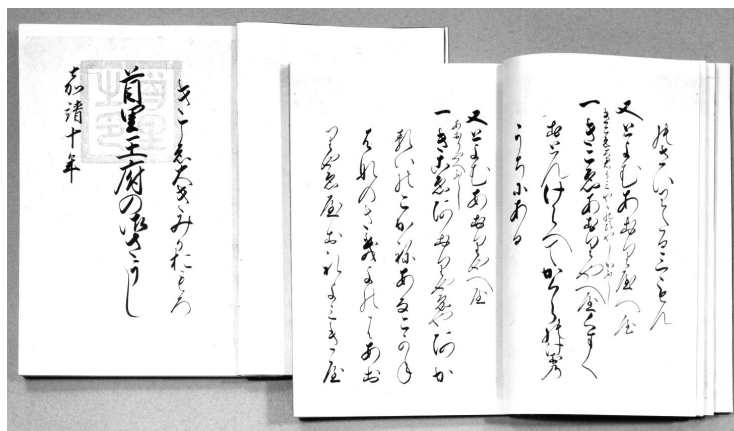
福建师范大学 协和学院 刘 丹

[摘 要] 琉球古代歌謡集《思草紙》由琉球王府主持编纂,收录了自十二世纪至十七世纪的民间歌謡与宫廷祭歌。本文通过分析《思草紙》中涉及中国和中琉交往的歌謡,结合《明史》《中山世譜》《球陽》等中琉双方史籍,探讨册封贸易叙事、唐船与航线描写以及中国意象与王权象征的关系,发现《思草紙》通过歌謡这一形式,不仅保存了中琉交往的历史记忆,揭示了中琉关系在区域秩序与文化认同层面的深层意涵,同时塑造了琉球作为海上王国的主体性认知。

[关键词] 思草紙 中琉关系 琉球歌謡 朝贡体制 文化认同

引 言

琉球古代歌謡集《思草紙(おもろさうし)》^[1](见图1)(通称《奥摩罗双紙》)共22卷,由琉球王府主持编纂,收录十二至十七世纪冲绳诸岛歌謡1554首,是研究琉球历史文化与对外关系的重要文献。其中,第1卷、第2卷的成书时间分别为嘉靖十年(1531年)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第3卷至第22卷的大多数成书于天启三年(1623年)。虽然第11、14、17、22卷未标注具体成书时间,但结合编纂背景与文本特征,可推测其成书时间约在1613-1623年之间。这些歌謡最初多用于祝女吟诵与宫廷祭祀等场景,在琉球王府编辑与整理过程中,逐渐被赋予了记录国家历史文化、彰显王权合法性、书写对外关系的功能。整体而言,《思草紙》以歌



资料来源:冲绳县立博物館藏.<https://okimu-jp-c.athp.transer.com/museum/column/1688633888>。

图1 『おもろさうし』(尚家本、冲绳县立博物館藏)

谣为载体,不仅塑造了琉球作为海上王国的主体性认知,而且保存了中琉交往的历史记忆。

中国学界对《思草纸》的关注较少。日本学界方面,伊波普猷等对《思草纸》进行了整理和校注^[2],高桥俊三、岛村幸一、间宫厚司从语言学和文学角度选取《思草纸》部分歌谣进行赏析^[3],末次智、福宽美、波照间永吉等以文学及历史学结合的方式对《思草纸》所反映的古琉球历史展开分析^[4],池宫正治、吉成直树、真喜志瑶子等则从民俗学角度对《思草纸》中的神女信仰和祭祀礼仪等进行了文化解读^[5]。可见迄今学界关于《思草纸》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学、民俗和语言学层面,但对其中蕴含的中琉关系书写缺乏系统探讨。

虽有学者对《思草纸》进行过校注,并将其译为现代日语,为该文献的传播与研究提供了便利,但此类校注与译本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学者个人的解读与阐释,易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文本原始意涵。相较于经过后世加工的校注本与译本,比嘉实所编《尚家本思草纸》是现存的年代最早且最为珍贵的版本,更贴近文献原始形态,能够减少后世解读带来的干扰,故本文将其确定为基础研究文本。

但需注意的是,《思草纸》中的歌谣兼具宗教祈福与政治象征属性,在流传编纂中难免融入神话想象与主体的认知,并非完整记载史实的官修史书,与《明史》《琉球国志略》《中山世谱》《球阳》等典籍存在本质区别,不能完全将歌谣内容与具体历史直接对号入座。故本文并非以其为直接史料还原历史细节,而是将其涉及中琉交往的专有名词、文化意象及叙事模式视为琉球社会的文化表征,通过与双方史籍互证,探析琉球对中琉关系的认知框架、书写策略与认同建构路径,以期在正视文本局限性的基础上,发掘其中琉关系史与区域文化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1 中琉封贡贸易的歌谣叙事

《思草纸》中涉及对中国及中琉交往的歌谣分散在各个卷中。其中,卷6-311^[6]、7-356、11-582(21-1507)^[7]、13-753、13-761、13-764、13-780、14-1018、15-1117、19-1310以及22-1550歌谣的题解中更是明确出现了“唐”字眼。同时期编撰的《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实录》卷252明确记载“大唐国(即大明)”^[8](池谷望子等,2005:96),加之《思草纸》的成书时间为1531-1623年,清朝建立时间为1635年,因此,可推测《思草纸》中的“唐”一词均指明朝。

明洪武五年(1372年)中国与琉球确立册封关系,琉球加入中国宗藩体制。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琉之间一直保持册封与朝贡关系。这种封贡关系可以说是中琉关系的核心,在《思草纸》中亦有所体现。

一 尊贵的君良神女啊

愿王之德业与威望

广被唐土、宫古、京都、镰仓

又 尊贵的君良神女啊^[8]

(卷6-311)

这首歌谣出现了“唐土、宫古、京都、镰仓”等地名。当时“唐土、京都、镰仓”对于琉球来说为外国,该歌谣将宫古与其并列,可知此时宫古还未处于琉球王府的统治之下。据载1390年宫古、八重山开始向中山纳贡,1500年首里王府派三千名士兵镇压“远弥计赤峰之乱”^[9],并在宫古、八重山设置管理机构。可推测此歌谣的创作时间在1500年前。加之此歌谣所收录的《思草纸》第六卷标题为“首里大君、精君、君加那志、百度踏扬君顶之思草纸”,包括了首里大君、精君、君加那志、百度踏扬四个高级别神女。由于琉球王国的神女组

织形成于尚真王时代(1477-1526),因此可确定此歌谣的创作时间为第二尚氏王朝尚真王时期,且在1500年前。此时,琉球国已被纳入中国的宗藩朝贡体制之内。这首歌谣将“唐”置于首位,对其敬仰与依附态度可见一斑,是中国作为宗主国核心地位的重要体现。

一 尊贵的奥和茂利神女啊

祈愿通航京都、镰仓、交刺巴

南蛮、唐土、宫古

齐聚一处相往来

又 尊贵的奥和茂利神女啊

(卷7-356)

该歌谣与上述卷6-311在内容和结构上相似,均以“神女祈祷”这一琉球宗教仪式为载体,将“唐”即中国纳入琉球的地域秩序神圣化叙事中。只不过该歌谣拓展了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除了“京都”“镰仓”“唐土”“宫古”外,还出现了“交刺巴”和“南蛮”等地名。在《思草纸》中,“南蛮”一词泛指南方诸国,“包括河内、安南、暹罗、吕宋、马六甲、爪哇等地”(外间守善,1972:141),大体相当于今东南亚区域。据赤岭诚纪《大航海时代的琉球》统计,在琉球大航海时代^[10],“琉球王府派遣至东南亚各地的船只约102艘,随行役员有11387人”(赤岭诚纪,1988:36)。而关于琉球与南蛮正式往来的最早史料,可见《历代宝案校订版》第二册卷40,其中收录了洪熙元年(1425年)琉球国王尚巴志给暹罗国王的咨文(冲绳县教育厅文化财课史料編集班編,2023:535-536)。至于“交刺巴”,分别有印度尼西亚爪哇(伊波普猷,1993:110)和“韩”即当时的朝鲜一说(池宫正治,2003:19)。据统计,自1389年琉球察度王遣使至高丽王朝,到1480年尚圆王遣使至朝鲜王朝止,琉球共遣使40次左右,数量之多,可见往来频繁。而当时,爪哇岛西部地区被称为“巽他·卡拉帕”,“琉球派遣至此的船只仅有2艘”(高良仓吉,2012:146)。鉴于“交刺巴”和“南蛮”在这首歌谣中并列存在,而非从属关系,因此,此处的“交刺巴”并非指“爪哇”,而是当时琉球频繁遣使的朝鲜。

歌谣中“祈愿通航京都、镰仓、交刺巴/南蛮、唐土、宫古/齐聚一处相往来”显示了琉球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行为,并且将中国视为对外交往的中心。而“京都”“镰仓”“交刺巴”和“南蛮”等地名的并列,则凸显琉球是各方交汇的枢纽,呈现出琉球王国航海网络的贸易全景图,希望来自不同地域的交流汇聚一处,海路顺畅,贸易互惠。这与1458年铸造的“万国津梁”铜钟的铭文“琉球国者,南海胜地也,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异产至宝满十万刹”(新屋敷幸繁,1971:214)高度一致,折射出琉球对中国的仰赖与依附,并通过中国朝贡体系,以“调和者”的中介贸易形式把中国、日本、南蛮、宫古等不同区域联系起来,获得与日本、东南亚贸易的合法性与便利,从而确立“万国津梁”的海上王国主体地位。

《思草纸》卷22是首里王府在进行官方仪式时吟咏的歌谣,“主要从前几卷中挑选编纂而成”(外间守善校注,2000:449)。其中:

一 伟大的美津良志神女啊

舟船启航,佑其安全

又 尊贵的美津良志神女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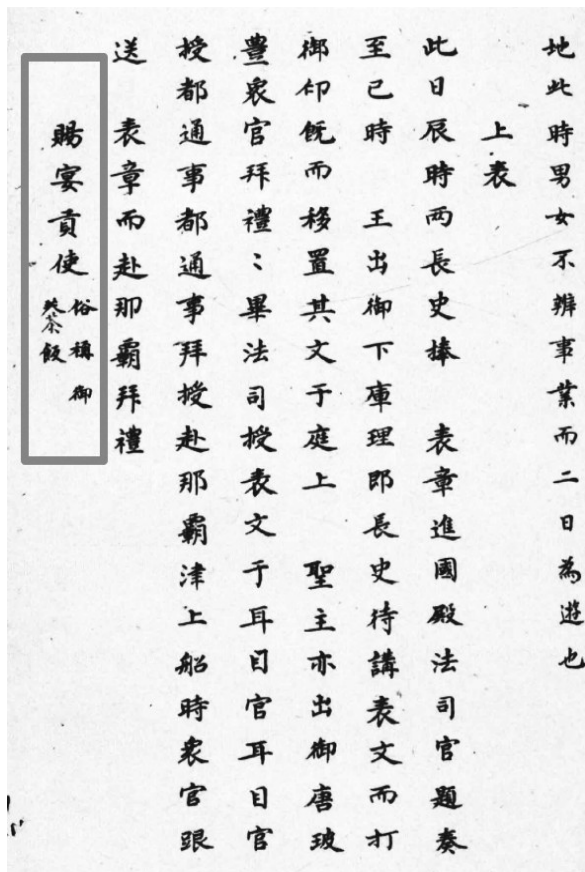
(卷22-1550[13-746])

该歌谣的题解「唐船すらおるし又御茶飯之時」清晰说明了咏颂的场景。「すら」注有「舟作場の事」(造船厂),可认为「すらおるし」为“舟船进水仪式”(佐藤清,2002:126)。故这首歌谣是在举行唐船下水仪式和御茶饭时所咏,而御茶饭则与中琉朝贡之事有所关联。《琉球国旧记》之“(十月)赐宴贡使(俗称御茶饭)”条目载“此日辰时。贡使率僚官。进城见朝。既而造大网。赐酒宴。宴毕。圣主亦出御唐玻丰。使者唱旅歌。已致退城。到各宅。以为贺礼”(见图2)(郑秉哲,2013:469-470)。《琉球国由来记》之“(十月)渡唐众御茶饭(王舅渡唐之时,于御内原,有御茶饭。于今无之。详见王府御双纸王舅)”条目的记载则更加详细(外间守善编,1997:43)。可知御茶饭是首里王府为渡唐使团举行的正式筵宴,兼具饯行、祈福和政治象征意义。“渡唐众御茶饭”体现出琉球王府对朝贡使团的高度重视,它不仅是内部宫廷仪礼,更是向中国朝贡前的重要政治准备。

一 首里国王
爱子神游
舞姿曼妙

(卷22-1554[12-6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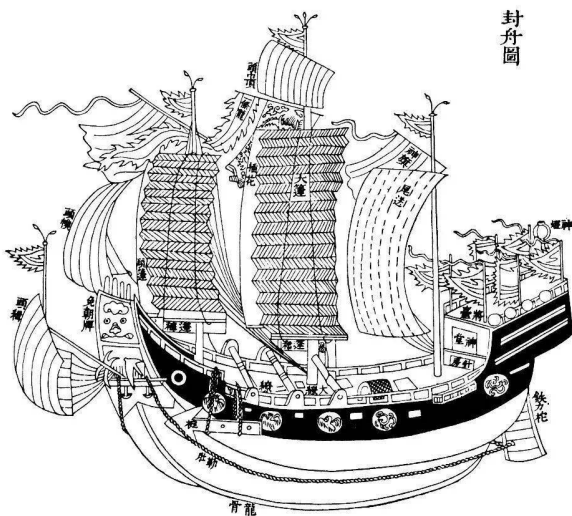
这首歌谣的题解「御冠船之御時おもろ」明确指出此为御冠船来航之际所咏。其中,“御冠”即王冠,象



资料来源:郑秉哲.琉球国旧记[M]//高津孝,陈捷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14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469。

图2 《琉球国旧记》所载“御茶饭”条

征加冕与册封,“御冠船”则承载册命、王冠、印绶等确立王统正当性的象征物,因此并非指一般舟船,而是“册封舟”,“为中国册封使团所乘之官方使船”(见图3)(丰见山和行,2000:137)。在中琉关系框架中,册封制度构成琉球王国地位合法性的根基,御冠船作为册封仪制的核心媒介,被视为外来权威的具象载体,其来航象征着天朝对琉球国王地位的确认以及中琉宗藩秩序的缔结。因此,在《思草纸》中,御冠船凝缩为政治正统、王位承认与国家秩序得以延续的象征,体现了琉球社会如何将中琉册封关系吸纳、转译并融入本土的歌谣中。



资料来源:徐葆光.中山传信录[M]//台湾文献丛刊第306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1972:2-3。

图3 册封舟(徐葆光《中山传信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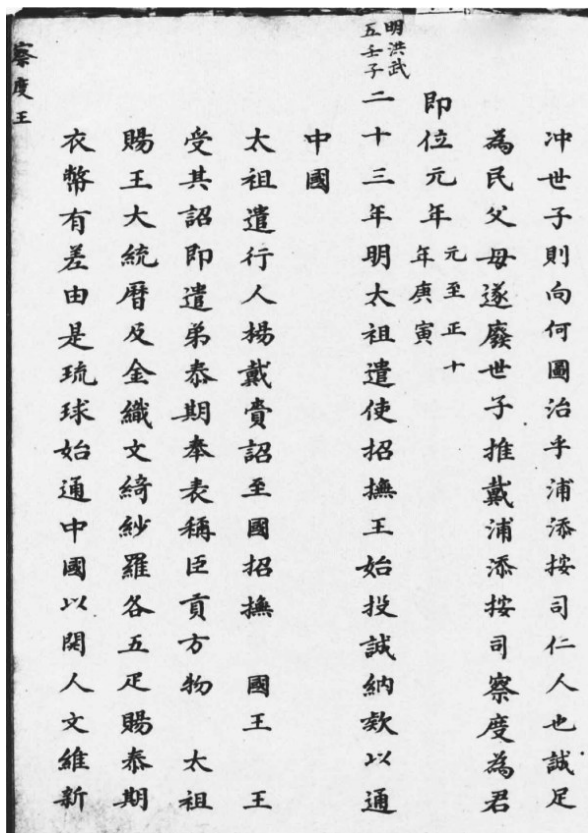
而关于中琉双方最早的朝贡贸易往来,《思草纸》收录了如下歌谣:

一 谢名豪族
敦氏之胤
容仪端秀
心慕仰钦
又 百司所盼
仓廩亲启

(卷14-982)

此处的“谢名豪族”指察度(仲原善忠、外间守善,1978:219),为浦添间切^[11]谢名村奥间大亲之子,1350年即位为第一代察度王朝国王。《琉球国志略》中关于察度的出身记载:“察度,父为浦添间切谢那村奥间大亲;业农,质性纯厚。天女来格而生察度,始为浦添按司;……明洪武初,遣行人杨载颁诏至国,奉贡归诚”(周煌,2020:224)。其中,“谢那村”即“谢名村”,明确指出察度的父亲是浦添间切谢名村的按司^[12]奥间大亲,说明察度的出身确实为浦添谢名。此外,这首歌谣中提到“百司所盼/仓廩亲启”意即察度开辟了中琉朝贡贸易之路。中琉双方史料对此均有明确记载。《明史》卷323记载:“(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命行

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其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随载入朝,贡方物”(张廷玉等,1974:8361)。琉球官修史书《球阳》则记载:“(察度王)二十三年(1372年),明太祖遣使招抚,王始投诚纳款,以通中国”条载“太祖遣行人杨载赍诏至国招抚……王受其诏,即遣弟泰期奉表称臣,贡方物”(见图4)(郑秉哲等,2013:83)。这些史料互相印证,表明泰期作为察度王弟,在1372年开辟琉球与明朝宗藩朝贡关系中具有奠基性的地位。而关于泰期,《思草纸》中亦有相关歌谣。如:



资料来源:郑秉哲等.球阳[M]//高津孝,陈捷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7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83。

图4 《球阳》载明太祖诏谕琉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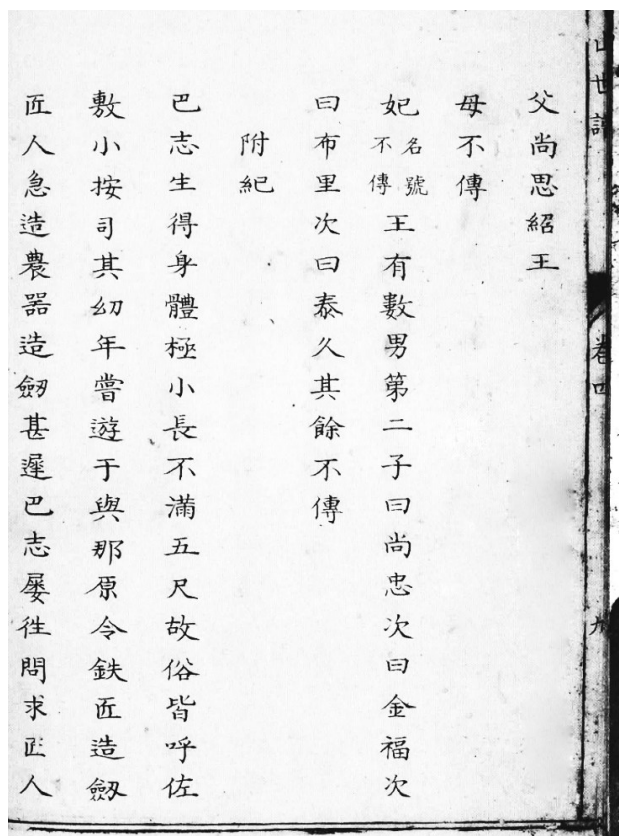
一 宇座泰期啊
通唐贸易昌
深承按司宠
又 伟大的泰期

(卷15-1117)

该歌谣赞颂了中头郡读谷村宇座出身的泰期在推动中琉贸易往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思草纸》中,除察度外,卷13-761的“首里国王/开辟唐道”与卷14-1018的“手登根大屋子/开辟唐道”还直接出现“唐道”,即中琉往来。关于卷13-761中“首里国王”的身份界定,有1420年迁都首里城的尚巴志一说(池宫正治,2003:27)。然而,由于《思草纸》中许多歌谣的创作时间和创作者信息均未明确存留,因此结合当前已有文

献无法确切判定此处的“首里国王”究竟是察度还是尚巴志,有待更多新史料的发现来进一步厘清。

相较于“首里国王”身份的模糊性,卷14-1018中“手登根大屋子”的身份,可通过多部史籍的相互印证得以确认。首先,《思草纸辞典》作为解读《思草纸》的重要工具书,明确将“手登根大屋子”解释为岛尻郡佐敷村的部落首领(仲原善忠,1978:235)。而关于这一身份背后与“开辟唐道”的关联,琉球官修史书《中山世谱》曾明确记载:“(尚)巴志。生得身体极小。长不满五尺。故俗皆呼佐敷小按司”(见图5)(蔡温等,2013:178)。《琉球国志略》也有相似记载:“尚巴志,思绍子。初,嗣父为佐敷按司”(周煌,2020:224)。共同印证了尚巴志在成为中山王之前曾以佐敷按司的身份活动于佐敷地区,而这一地域背景恰好与《思草纸辞典》中“手登根大屋子”所属的岛尻郡佐敷村相重合,为二者建立关联提供了地域线索。



资料来源:蔡温等. 中山世谱[M]//高津孝,陈捷编. 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4册.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78。

图5 《中山世谱》载“尚巴志”条

记载琉球王府第一尚氏由来的古文书《佐铭川大主由来记》则以更详细的记载揭示了“手登根大屋子”与尚巴志的直接关联。据该文书载,佐敷小按司成为中山王尚巴志后,曾派其弟平田大屋子之子手登根大比屋赴明请封(岛村幸一等,2022:22)。正是在册封使抵达琉球之后,为赞颂尚巴志推动中琉官方往来、开辟“唐道”的功绩,才诞生了卷14-1018中“手登根大屋子/开辟唐道”的歌谣(伊波普猷,1974:159)。这一记载不仅明确了“手登根大屋子”即手登根大比屋的身份,更清晰解释了歌谣创作的背景与“开辟唐道”的具体所指。《佐敷町史》也提到在冲绳本岛南部佐敷町手登根小字前原的田野里立有高185cm的石头,传说是十五

世纪前半叶的尚巴志时期,名为手登根大比屋的人与中国开启贸易往来时从福建省带回琉球。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当地人将这块石头命名为“福建石”(佐敷町史編集委員会編,1984:501)。这一实物传说与《佐铭川大主由来记》中“手登根大比屋赴明请封”的记载相互印证,不仅让“手登根大屋子开唐道”的历史场景更为具象,也从民间记忆层面强化了手登根大比屋作为中琉贸易开拓者的身份,使《思草纸》中这一歌谣的史料价值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

至于尚巴志向明廷请求册封的时间,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琉球国志略》卷三记载:“(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世子尚巴志遣使奉表贡方物”(周煌,2020:66),反映出1423年尚巴志主动向明朝递表求封的朝贡行为,尽管当时其身份可能只是“世子”,但可明确尚巴志向明发起册封请求的时间为1423年,比察度与中国建交晚了半个世纪左右。

2 唐船与风向、航线的文学表象

在《思草纸》中,以“~富「とみ」”结尾的船名颇具特色,可理解为类似于“~号”的船只称谓。《思草纸辞典》将“~富”释作船只美称,与“声明远扬”同义(仲原善忠,1978:244)。《思草纸》中以“~富”为后缀的船名数量颇多,卷1-38和3-95两首歌谣中,均出现“世续富「よつきとみ」”船的记载。虽然歌谣中仅记载了该船名的日语假名「よつきとみ」,但同一假名的船名亦出现在《田名家文书》所收嘉靖十六年(1537年)八月的《渡闽船世续富船头职位补任任命书》(冲绳县教育厅文化课编,1979:28)。琉球首里系家谱资料《麻姓世系图家谱》“四世真孟”条明确记载“嘉靖十六年丁酉八月九日叙座敷,本年八月二十日为进贡事,正议大夫陈赋、长史蔡廷美赴中华之时,为世续富御船之使者到闽”(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編集室編,1982:582),其中出现该船的汉字名称为“世续富”,且时间、渡航目的地均与《田名家文书》所记「よつきとみ」船的背景高度契合。由此可证,「よつきとみ」即是汉字“世续富”的日语读音,二者指向同一艘琉球官方船只。该船曾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作为朝贡使团的船只渡海前往中国福建。

一 赤金船头
赫赫金富
仰禀大君
虔祈南风
佑我航程
又 赫赫金富
赤金船头
又 扬帆唐土
至诚祷请
大唐菩萨

(卷13-764)

这首歌谣主要赞颂“金富”船及其船头“赤金”的伟大,同时指出其航行时向“闻得大君”^[13]祈求真南风保佑安全。又因此船开往唐土,故向“大唐菩萨”虔诚祈祷。“金富船”并非普通舟船,其命名方式饱含琉球对贸

易财富的热切期盼。而“唐”的明确提及,进一步锁定了船只的贸易指向。“唐”作为《思草纸》中对明朝的专属称谓,直接点明这艘船的航行目的地与贸易对象是中国。歌谣通过这一地理标识,将“金富”的财富愿景与中琉封贡贸易的现实基础紧密相连,暗示财富的获取源于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凸显了中琉关系在琉球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歌谣中“南风”意象的出现也绝非偶然,而是琉球航海经验的凝练表达。琉球地处亚热带季风带,古代中琉贸易航线的往返高度依赖季风。赴华时借秋冬东北风起航,返航则凭春夏西南风,即歌谣中的“南风”归航。歌谣中“祈南风”的举动,既是祝女对神灵的虔诚诉求,更是对航海自然规律的精准把握。

一 南风铃鸣,以为船名
 南风拂时,载宝归棹
 唐土奇珍,南蛮异宝
 又 顺风鸣铃,以为船名
 顺风拂时,扬帆归道

(卷13-780)

该歌谣描述了南风铃鸣号神船、顺风铃鸣号神船满载中国和东南亚物品归航之场景,“南风”与中琉贸易航线的关系可从中窥探一二。“南风”在夏季盛行,为船只从中国、东南亚驶往琉球时的理想风候,被视为天意眷顾与航行顺利的标志。“顺风”指从船尾方向吹来、推动船只前进的风(仲原善忠,1978:101),蕴含风神护佑之意,也是航海者最为期盼的风向。这两种风向与琉球群岛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密切相关,冬季盛行东北风,夏季则盛行西南风,而西南风正是琉球船只在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完成贸易后返航的顺风。利用季风航行的习惯是古代远洋航海活动中遵循的重要原则,琉球船也不例外,赴中国、东南亚进行贸易时,通常利用每年八月至十一月的东北季风从那霸出发……处理一切贸易事务后再趁三月到四月的西南季风回航(吴霭华,1991:78)。因此,歌谣中的“南风”并非随意选取的自然意象,而与琉球和中国、东南亚的贸易航线紧密相关。

中琉交往依赖于海上航路,航海与港市也成为《思草纸》中的重要主题。歌谣中频繁提到舟船和那霸港的繁盛景象,体现了琉球在与中国交往时对海上交通的依赖。舟船既是物质载体,又承载了真实的地理位置与贸易路径。那霸作为中琉交往的窗口,不仅是贡物集散之地,也象征了琉球在东亚海域中的独特地位。

一 首里国王
 兴筑那霸
 唐舶蛮舟
 云集于此
 又 首里国王

(卷13-753)

该歌谣描绘了中国与南蛮船只汇集那霸港的繁荣景象。朝鲜王朝初期的政治家申叔舟(1417-1475)在1471年编纂的外交地理文献《海东诸国纪》中记载“日本南蛮商舶,亦集其国都海浦”(申叔舟,2015:149)。这里的“国都海浦”指的就是琉球国都首里所依托的海港——那霸港。据考古发掘推定,在琉球三山时期^[14],首里是中山王国都城所在地。首里按司尚巴志统一三山、建立琉球王国后,以首里城为王城,并将那霸港建设成为与中国等地贸易的据点(安里进等,2004:80-81)。尚金福王时期(1450-1453)在那霸港的入江口修筑

长虹堤连接首里城,尚德王时期(1461-1469)再次修建那霸港(赤岭守,2004:63)。可以说,古琉球时期的王权统治体系,是以具有宫廷行政机能的首里与承担港湾交通机能的那霸为核心据点,统治奄美群岛至先岛群岛的各个岛屿(高良仓吉,1993:377-382)。十五世纪之后,那霸港更是作为琉球最大的港湾都市发展成为国际贸易的据点(上里隆史,2018:48)。中国、东南亚的商船汇集于此,盛极一时,从而确立了“万国津梁”的地位。《思草纸》的这首歌谣也同样突显了那霸港在琉球对外贸易中的中心地位。

除了那霸港,《思草纸》中还有歌谣提到知念,并直接出现了“唐船”字眼。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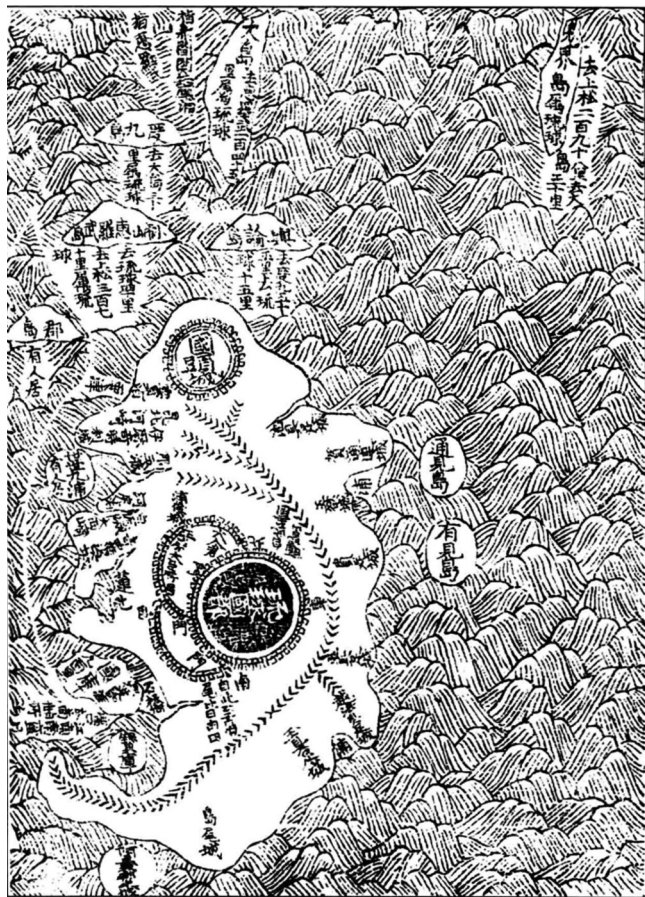
一 知念神城

唐船云集

又 巍巍神城

(卷19-1310)

该歌谣篇幅短小,却蕴含着丰富的象征内涵。知念地处琉球南部,既是古代琉球重要的圣域,也是舟船往来频繁的港口。《海东诸国纪》所载《琉球国之图》,除那霸港外,还在读谷村长滨附近的河尻泊和南城市奥武岛附近的玉城城迹明确标注出作为港湾的“浦”(见图6)(申叔舟,2015:97)。“唐船”指往返于中琉之间的



资料来源:申叔舟.海东诸国纪[M]//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一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97。

图6 《海东诸国纪》所载《琉球国之图》

船只,象征着中国封贡体制下的官方贸易。“云集”一词则形象描绘出唐船频频停泊的繁华景象,凸显了知念在中琉交通与交流体系中的枢纽地位。

依托舟船意象基础,再结合金银与目的地的指涉,即可清晰勾勒以琉球为轴心的跨国贸易流通叙事:

一 具志川城,筑地雄伟
神女灵圣,祝祷四方
又 具志川城,筑地雄伟
又 愿彼唐船,金宝盈舱
来集于此,汇于我邦
具志川城,筑地雄煌
又 愿彼大和船,金宝盈舱
来集于此,汇于我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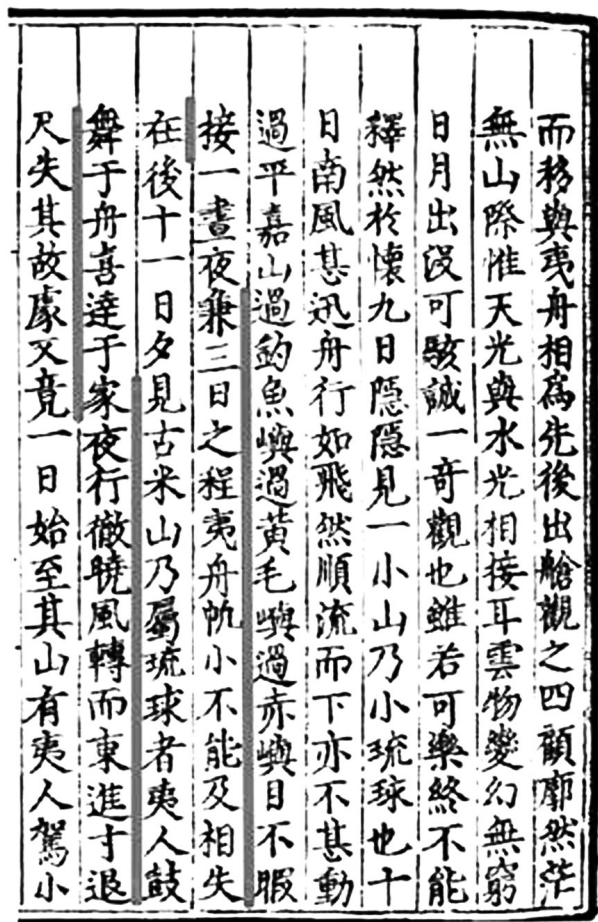
(卷11-582)

该歌谣中同时出现了“唐船”和“大和船”。卷21-1507与其大同小异,不同之处仅在于只出现“唐船”而未见“大和船”。或许因为卷21为「久米二間切之才モロ」(久米二间切之思草纸),而久米岛为琉球通往中国的必经航线,故而将“大和船”删除,只保留“唐船”。

一 尚真御舟扬
见久米阿良
翌日至那霸

(卷13-900)

该歌谣吟唱琉球尚真王的船从海外归航时,先途经久米岛再到那霸港,进一步验证了久米岛在中琉航线中的重要位置。“久米阿良”作为航海道标,在歌谣中既是物理导航标识,更是中琉交往语境下的文化坐标。久米岛位于琉球岛与中国福建之间,是中琉朝贡船往返的必经之地。通常,从那霸港出发的朝贡船,需先经久米岛确认航向,再穿越台湾海峡抵达福州;返程时,望见久米岛阿良岳即意味着接近琉球国,可规避外海风浪风险。歌谣中“见久米阿良/翌日至那霸”的表述本质是对中琉航线的经验总结。无论是琉球船只回航,还是明清册封使团去琉球,都要依赖季风,因此可通过册封琉球使团的航线来推测琉球船只回航的时间和航线。而关于琉球册封使团的航行,在张学礼、徐葆光等册封使的册封使录中都有明确记载。例如,明代册封使陈侃在《使琉球录》(1534)中载:“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见下页图7)(陈侃,1970:11),表明当时琉球人看到古米山便知己至本国境内。同样,张学礼的《使琉球记》(1663)中记载“归程:(1663年)十一月十二日,登舟,十四日出那霸港,过姑米山;二十一日,抵战台;二十三日,见浙江定海;二十四日,到五虎门”(张学礼,1971:7-9)。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海宝、徐葆光册封琉球,“归程:次年二月十六日,自那霸港开洋,过马齿、安根呢、度那奇等山,见姑米山二点……三十日,进五虎门”(徐葆光,1972:16),徐葆光在《中山传信录》(1721)中也曾对中琉间的航道与针路进行概括:“琉球归福州,出姑米山,必取温州南杞山”(见下页图8)(徐葆光,1971:9-11)。上述史料中的“姑米山”和“古米山”均为今久米



资料来源:陈侃.使琉球录[M].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1970:11。

图7 陈侃《琉球使录》中所载中琉航线



资料来源:徐葆光.中山传信录[M].台湾文献丛刊第306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1972:1。

图8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封面

岛。从以上史料可清晰推测久米岛与那霸港的相对位置,可见歌谣中“见久米阿良/翌日至那霸”并非凭空想象,确实与史实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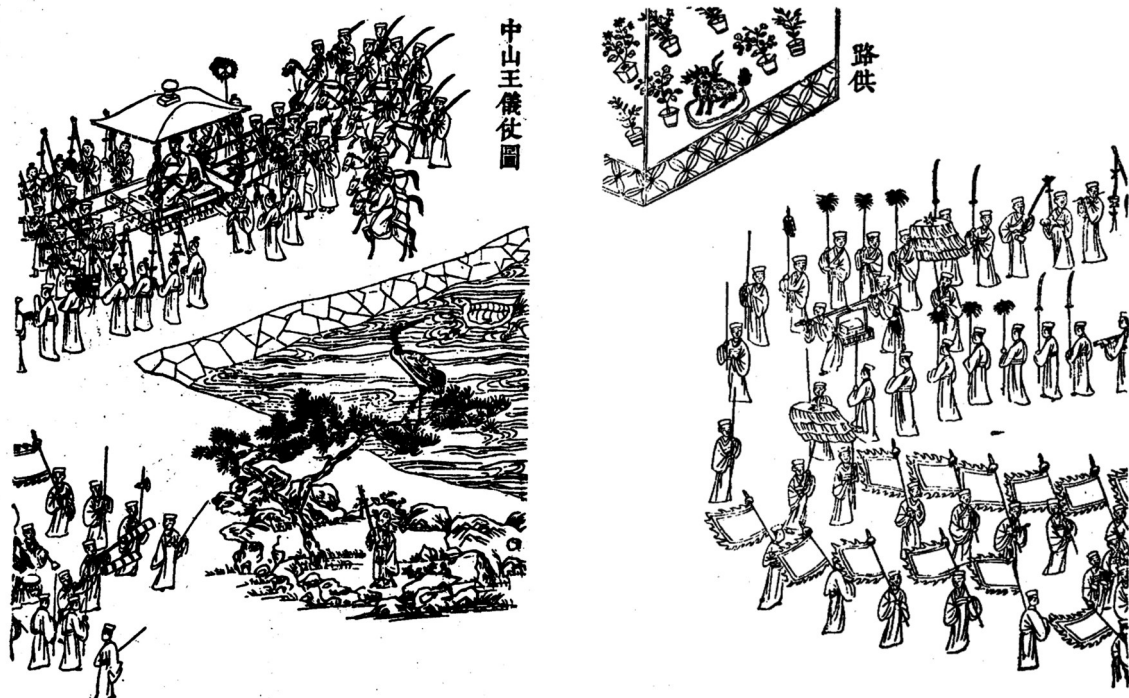
3 物象与信仰观念的中国影响

《思草纸》中亦有歌谣通过物象与信仰观念的描绘,展现琉球在文化象征方面对中华文明的吸纳和再造。这些物象往往超越了单纯的自然或器物描写,承载着王权合法性和宗教信仰等深层寓意。特别是凉伞和凤凰等意象,不仅具有鲜明的象征性,还折射出琉球在中琉关系互动中对文化元素的选择与转译。

凉伞,又称华盖,是古代中国帝王礼制的重要标识,象征着王权与尊严,史书中常有其作为朝仪重要组成部分的记载。《隋书》言:“仪仗伞扇,有轸牵车,不得入台门”(魏征等,1973:236)。《宋史》言:“太常寺本品鼓吹仪仗,殿中省伞一、曲盖二、朱漆团扇四,自第导引出城,量远近各还”(脱脱等,2011:2910)。明确规定了伞扇的使用数量;《明史》言“黄伞、华盖、曲盖、紫方伞、红方伞各二……”(张廷玉等,1974:1591)表示具体的仪仗配置,包括使用不同色彩的大伞。凉伞已成为皇帝仪仗中专门的礼仪器物,并受到严格规范,是朝仪的一部分。

早在琉球第一尚氏王朝时期,凉伞便传入琉球。“尚巴志王命贡使造凉伞而带回焉。本国之用凉伞自此

而始”(伊波普猷,1962:81)。可知尚巴志命令贡使制作凉伞带回琉球。与此同时,中华礼制也一同传入。嘉靖十三年(1534年)由陈侃主编的《使琉球录》对琉球国王的出行仪仗有详细记录。“伞盖用五色,从者数百人,鼓吹导前,戈矛拥后,仍以土硃小团扇四柄,贴金……仍以土硃小团扇四柄,贴金葫芦一对为仪卫”(陈侃,1970:31)。从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中的《中山王仪仗图》可清晰看出琉球国王出行仪仗中将凉伞作为仪仗器物(见图9)(徐葆光,1972:62-63)。《思草纸》的歌谣中亦多次出现“凉伞”意象。如:



资料来源:徐葆光.中山传信录[M]//台湾文献丛刊第306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1972:62-63。

图9 中山王仪仗图中的凉伞(徐葆光《中山传信录》)

(前略)

又 承国王嘉邀
 降临首里杜^[15]
 又 承贵人嘉邀
 降临真玉杜
 又 凉伞高张立
 辉映盛仪邦
 ……

(卷12-722)

又如:

(前略)

又 赫赫玻名城^[16]
 凉伞巍然立

天上京之内
宛然如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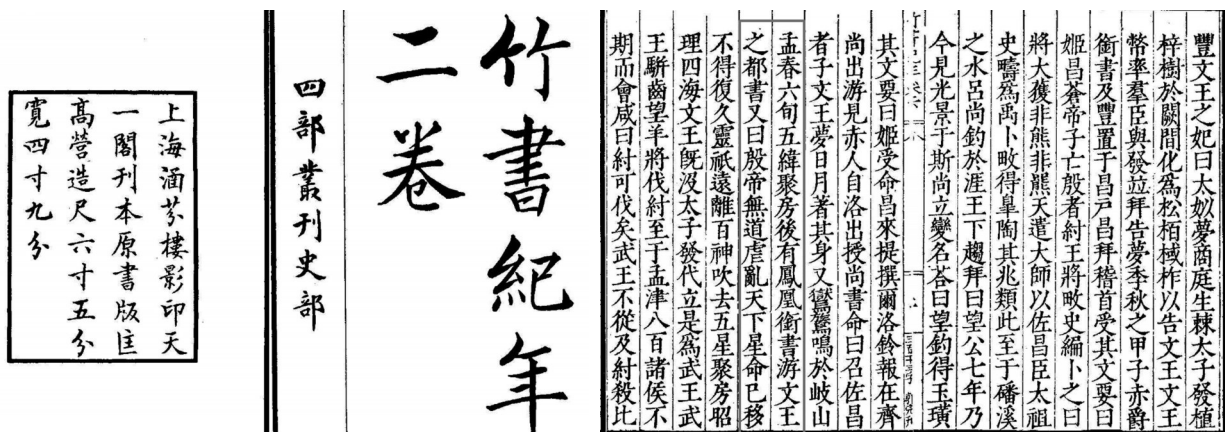
.....

(卷19-1322)

这两首歌谣中的“凉伞”并非单纯的仪仗器物描写,而是承载着深厚的象征意义。琉球王国在王权象征建构中借鉴了中华礼制元素,与此同时,凉伞在琉球的宫廷祭祀与王府仪典中又被赋予彰显王权威仪与尊崇神灵的功能,体现出琉球社会对王权尊严的重视。歌谣中“承国王嘉邀”和“凉伞高张立”意象将首里王府的宗教神圣性与王权政治的尊严相融合,展现出王权和神权一体化的象征秩序。

凤凰自先秦以来便是祥瑞象征,其与圣王德政、王朝盛世的关联,在传世典籍中多有印证。《尚书·益稷》载“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王世舜译注,2012:50),以舜帝雅乐感召凤凰的场景,把凤凰与太平盛世、圣王德治联系起来;《论语》“凤皇不至,河不出图”(李昉等编,1960:4054)的表述更将凤凰显现与圣王在位直接挂钩。这种关联在后世文献中持续延续,《竹书纪年》记载“凤皇衔书,游文王之都”(见图10)(沈约注,2),以凤凰祥瑞预示周文王受命于天、周室代商的天命归属;《太平御览》引《琴操》载周成王时“凤皇来舞于庭”(李昉等编,1960:4058),印证凤凰与天下大治的象征关联。至汉唐时期,凤凰仍被视为国运昌隆的隐喻,《宋书》载汉代宣帝、章帝年间凤凰屡现,统治者将其视作王道仁政的吉兆(沈约,2018:870);《资治通鉴》亦记武则天即位前有“凤皇自明堂飞入上阳宫”(司马光,2013:6669)之事,可见其借凤凰祥瑞为登极构建天命合法性。综上,凤凰与圣王、盛世的深度绑定,已成为贯穿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隐喻,是帝德与王朝昌盛的重要象征。

“凤凰”在《思草纸》中也并非单纯的鸟禽描绘,而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含义。



资料来源:沈约,注.竹书纪年:卷二(天一阁刊本)[M].影印本.上海:上海涵芬楼。

图10 沈约注《竹书纪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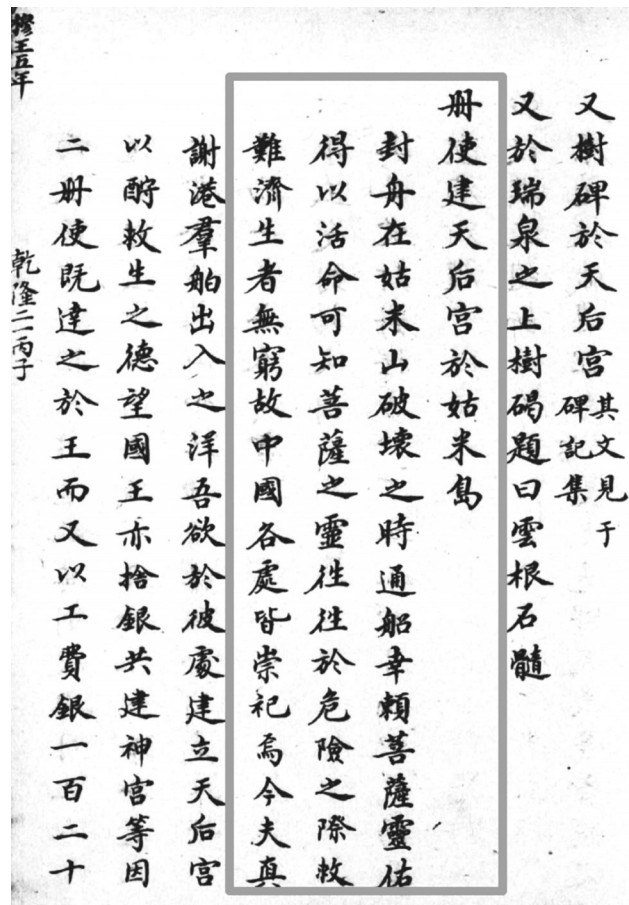
一 东方大主
初升丽景
凤舞呈祥

(卷13-825)

这里的“大主”是尊称,指代国王或具有最高权威的人,结合“东方”与“初升”,象征琉球国王被视作旭日般带来光明。接着,歌谣把旭日东升时的景象比拟为凤凰起舞。凤凰与旭日同时出现,将国王的地位与自然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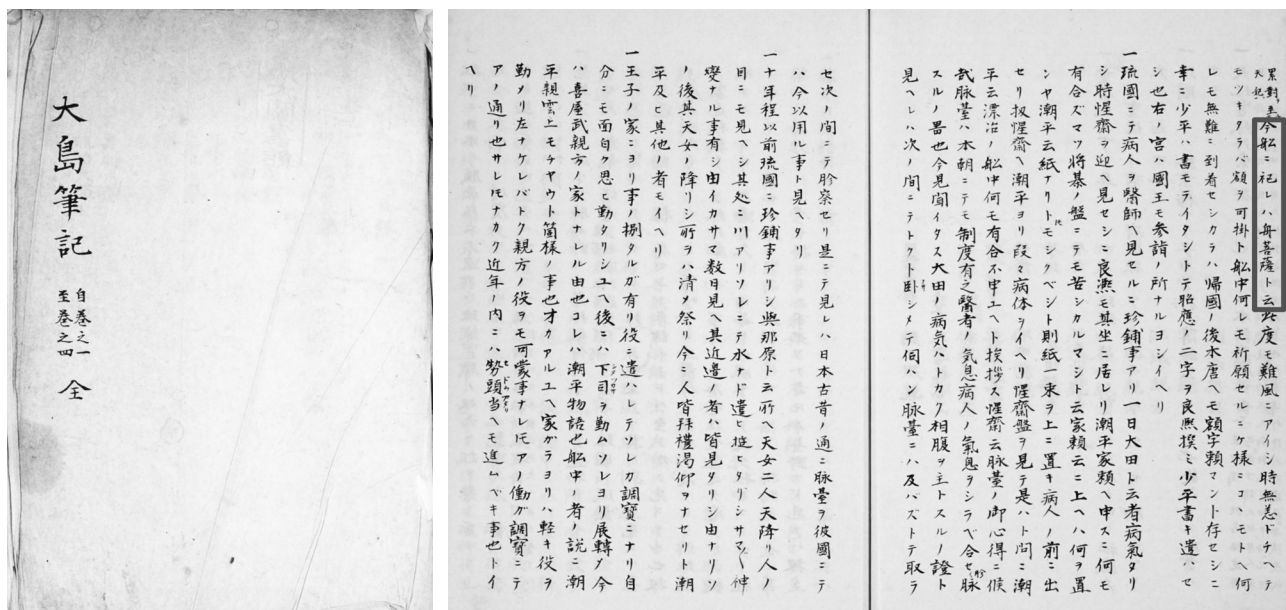
瑞结合,正与中国传统中“日、凤、龙”共同构成帝王符号的逻辑相一致。在中琉封贡体制下,琉球王权观念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凤凰作为帝德的象征,极有可能是因中华文化与礼仪典籍的传入而被吸收进歌谣体系。

作为口传歌谣的集大成之作,《思草纸》所收录的歌谣中屡屡出现航海相关的祈祷与祭祀。除了琉球本土自然崇拜与祖灵信仰,也体现了中国宗教元素的融入,其中之一即天妃妈祖信仰。上述卷13-764歌谣提到琉球渡唐船向“大唐菩萨”祈求航海平安之事。自宋元以来,妈祖作为“海上保护神”逐渐风行东亚。琉球史书《球阳》卷十五·尚穆王五年条载“封舟在姑米山破坏之时,通船幸赖菩萨灵佑得以活命,可知菩萨之灵往往于危险之际就难济生者无穷,故中国各处皆祭祀焉”(见图11)(郑秉哲,2013:41),此处琉球史料所称的海上护佑之“菩萨”,正是中国民间奉祀的妈祖。受此影响,琉球使团出航前也会到那霸上天后宫参拜妈祖,然后将妈祖像安置于船中,登岸后再安放至当地妈祖庙。《大岛笔记》中就有关于琉球开往萨摩的楷船上安置妈祖神像的记载:“今祀于船,称为‘舟菩萨’”(见下页图12)(户部良熙,抄本)。琉球贡使蔡大鼎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所作《恭逢天上圣母下天口占》:“黎明洒扫贡舟中,日暮恭迎自碧穹。尊敬神祇蒙庇渥,平安往复喜无穷。”(见下页图13)(蔡大鼎,2013:49)记载了琉球贡使在贡舟上进行的“接神”仪式。琉球还设了“总管”一职负责向妈祖上香。《琉球国由来记》载“总管”为“唐往来之时,菩萨烧香役也。”(外间守善,1997:60)《琉球国旧记》亦载“自往昔,王遣使中国时,必奉安天后菩萨于船内,以便往还,即设立此职,令她朝夕焚香。”(见下页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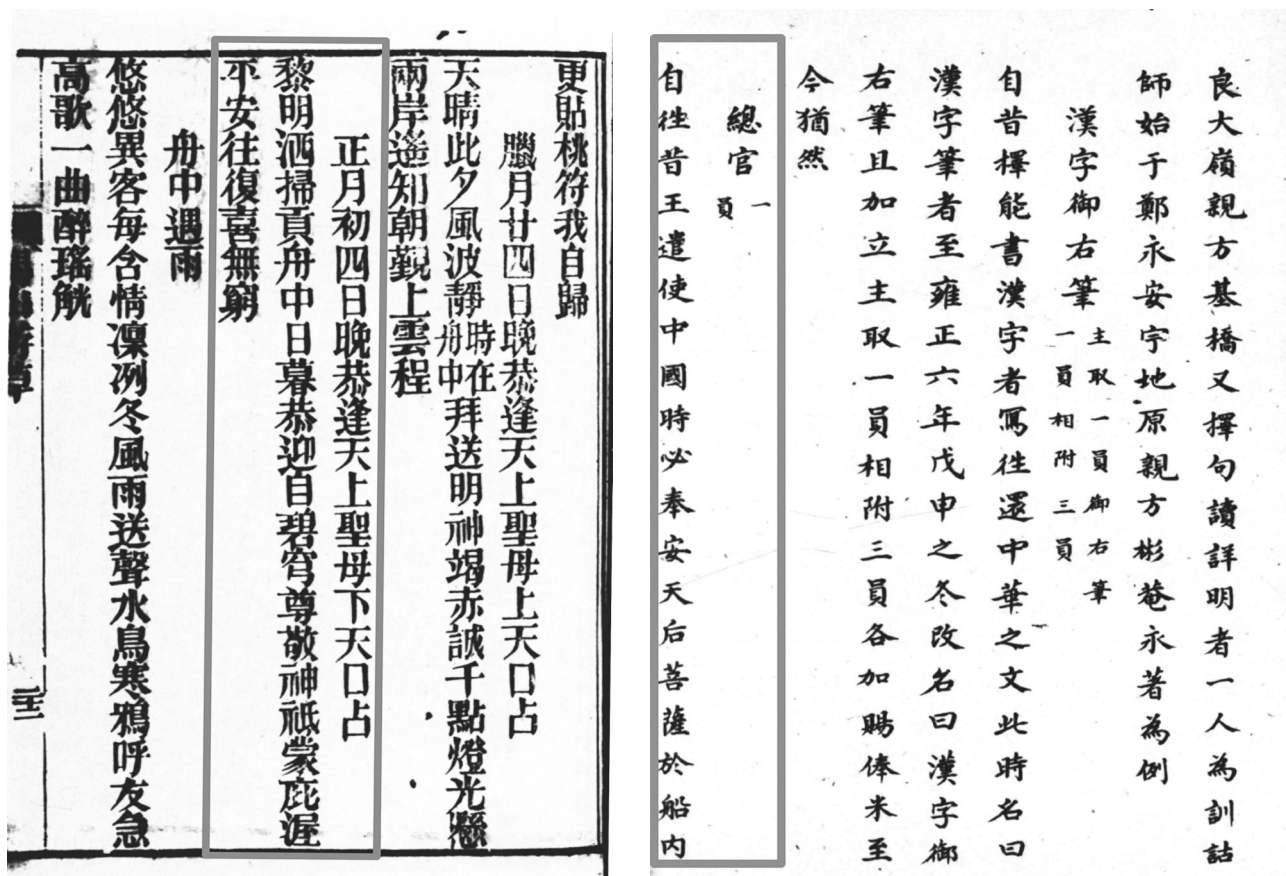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郑秉哲等. 球阳[M]//高津孝,陈捷编. 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7册.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41。

图11 《球阳》所载“菩萨”



资料来源:户部良熙.大岛笔记[M].琉球大学附属图书馆藏,http://purl.org/coar/access_right/c_abf2.

图12 户部良熙《大岛笔记》(琉球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资料来源:蔡大鼎.閩山游草[M]/高津孝,陈捷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28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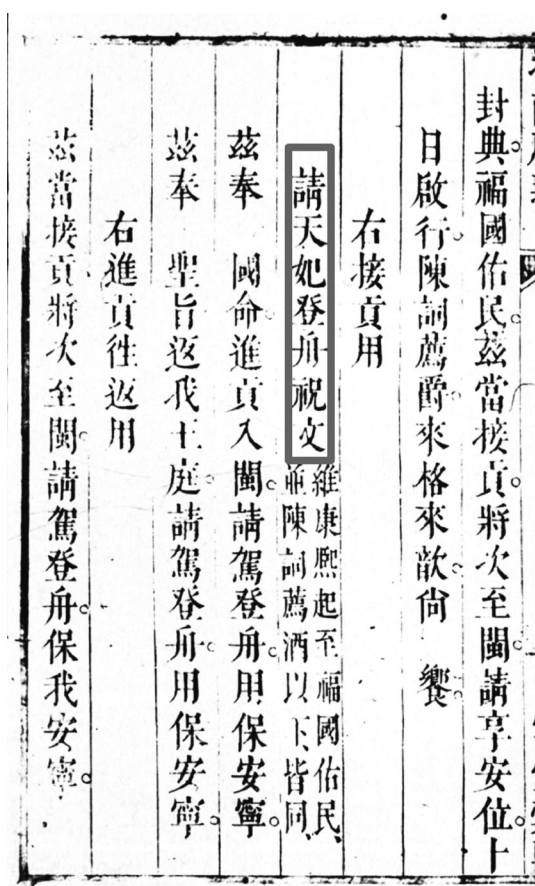
图13 蔡大鼎《恭逢天上圣母下天口占》(《閩山游草》)

资料来源:郑哲哲.琉球国旧记[M]/高津孝,陈捷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14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398.

图14 《琉球国旧记》所载“总管”条

(郑秉哲, 2013:398)进一步佐证了琉球船中所奉“菩萨”即妈祖, 且已形成规范化的祭祀体系。

琉球名儒程顺则(1663-1735)编纂的琉球航海书籍《指南广义》(1708)中也辑录了《请天妃安享祝文》《请天妃登舟祝文》《请天妃入庙祝文》《天妃诞辰及节序祝文》等祭祀仪式用文。其中《请天妃登舟祝文》曰:“兹奉国命, 进贡入闽。请驾登舟, 用保安宁”;“兹奉圣旨, 返我王庭, 请驾登舟, 用保安宁。”接贡往返亦有“兹当接贡, 将次至闽。请驾登舟, 用保安宁”;“兹竣贡事, 言旋至京。捧齋皇赏, 返我王庭。请驾登舟, 用保安宁”(见图15)(程顺则, 2013:50-51)。可知琉球贡舟上设有神龛, 安放天妃神像。琉球人进贡、接贡时必将妈祖请入舟中, 并祷祝天妃, 由此产生“登舟祝文”。或许由于妈祖作为镇船之神经常被请入舟中护航, 所以琉球人也称天妃为“舟菩萨”。因而, 这首歌谣出现“大唐菩萨”, 说明中国妈祖信仰已在琉球本土化的过程中转化为歌谣语言中的祈安符号。



资料来源:程顺则. 指南广义[M]//高津孝, 陈捷编. 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16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51。

图15 程顺则《指南广义》所载《请天妃登舟祝文》

4 结 语

琉球王府将原本零散流传于冲绳诸岛的歌谣编纂成《思草纸》, 使其既服务于宫廷仪式, 又成为展示王权合法性、本国独特文化和对外关系的象征性文本。歌谣中对封贡贸易的描写、唐船与风向航路的记录、港市风

貌的呈现,以及中国物象与信仰观念的影响,既真实反映琉球在朝贡体制下的实际经历,也清晰展现其文化认同的建构逻辑。其中的中琉关系叙事并非单向依附,而是朝贡体系下的一种自我表达。通过赞颂“唐”“唐船”“凉伞”“凤凰”、吟咏册封事件、记录港市与航线,琉球既确立了对中国的认同,确认自身在东亚秩序中的定位,又在文本中塑造了海上中介国形象。歌谣借助祝女吟唱、神灵庇佑等宗教化表达强化王权合法性,将中琉关系纳入神圣与政治交织的叙事体系,让中琉交往超越了单纯的外交行为,成为其自我认同建构的核心途径。

[本文为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琉球门中制与宗族社会研究”(批准号:23BSS049)阶段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刘丹]

注释

- [1]『おもろさうし』目前尚无正式出版的中文译本。国内既有研究中,王耀华、刘富琳等学者多采用音译“奥摩罗双纸”,本文对此译名予以尊重并加以注明。但该译名主要依据日语读音,未能体现琉球语源所蕴含的语义内涵。冲绳学者仲原善忠等指出,「おもろ」源自琉球语「うむい(思い)」,指将内在情思以韵律化语言进行表达的歌谣形式;《冲绳古语大辞典》则将「さうし」释作「草紙」,意为册子。基于上述语源与文献解释,本文采用“思草纸”作为解释性译名,并在首次出现时并列注明通行音译。
- [2]伊波普猷.伊波普猷全集:第六卷 おもろ選集[M].東京:平凡社,1924;伊波普猷,校訂.校訂おもろさうし[M].沖縄:郷土研究社,1925;仲原善忠.仲原善忠全集:第二卷 おもろ新集[M].琉球文教図書,1957;仲原善忠,外間守善.校本おもろさうし[M].東京:角川書店,1965;鳥越憲三郎,編.おもろさうし全集[M].大阪:大坂清文堂,1968;外間守善.おもろさうし(日本思想大系18)[M].西郷信綱,校注.東京:岩波書店,1972;外間守善,仲原善忠.校本おもろさうし[M].東京:角川書店,1972;比嘉実,編.尚家本おもろさうし[M].東京:法政大学沖縄文化研究所,1993;外間守善.おもろさうし[M].東京:角川書店,1993;外間守善,校注.おもろさうし:上、下[M].東京:岩波書店,2000;清水彰.標音おもろさうし注釈:一、二、三[M].大阪:和泉書店,2003-2004.外間守善,波照間永吉,編.定本おもろさうし[M].東京:角川学芸,2011.波照間永吉,校注.おもろさうし(琉球文学大系1)[M].沖縄:ゆまに書房,2022.
- [3]高橋俊三.おもろさうしの国語学的研究[M].東京:武蔵野書院,1991;高橋俊三.おもろさうしの動詞の研究[M].東京:武蔵野書院,1991;島村幸一.『おもろさうし』と琉球文学[M].東京:笠間書院,2010;間宮厚司.沖縄古語の深層:オモロ語の探究[M].東京:森話社,2014;島村幸一.立正大学文学部学術叢書:3 おもろさうし研究[M].東京:角川書店,2017;島村幸一.おもろさうし選詳解[M].東京:文学通信,2023.
- [4]末次智.琉球の王権と神話:『おもろさうし』の研究[M].東京:第一書房,1995;吉成直樹,福寛美.琉球王国と倭寇:おもろの語る歴史[M].東京:森話社,2006;波照間永吉,編.琉球の歴史と文化:おもろさうしの世界[M].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7;福寛美.おもろさうしと群雄の世紀:三山時代の王たち[M].東京:森話社,2013;比嘉佑典.おもろ琉球国史:神田と謝国に隠された仮面の正体[M].沖縄:新星出版,2024.
- [5]村崎燕子,池宮正治,吉本隆明.新潮古典文学アルバム別巻:ユーカラ・おもろさうし[M].東京:新潮社,1992;吉成直樹.酒とシャーマン:『おもろさうし』を読む[M].東京:新典社,2008年;真喜志瑤子.古琉球の王宮儀礼とおもろさうし[M].東京:平凡社,2023.
- [6]在本论文中,6表示这首歌谣所在的卷号,311表示这首歌谣在整本《思草纸》中的序号。
- [7]《思草纸》共有306首歌谣重复,本论文在括号内进行标注。
- [8]本文中歌谣的译文为笔者自译,优先考虑准确性,兼顾汉语美感,对于译文格式则不作统一规范。
- [9]指15世纪末八重山按司远弥计赤峰拒纳人头税并与琉球王府对抗,1500年尚真王派遣三千琉军征讨而平定的地方武装动乱。
- [10]琉球大航海时代,也称为大交易时代,是指15世纪琉球建立起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的多边贸易体系,取得了辉煌的海上贸易成就的时期。
- [11]琉球古代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村”。
- [12]相当于地方豪族。

- [13] 闻得大君是琉球神道中最高级神女的称号。在琉球王国第二尚氏王朝时期,闻得大君一职多由国王亲自任命,而且只能由国王的亲属出任。闻得大君的主要职责是为琉球王国的国家安泰、海路安全以及五谷丰登祈祷。
- [14] 三山时期为琉球本岛14世纪至1429年北山、中山、南山三个政权分立割据的时代。1429年中山王尚巴志先后灭南山、北山,完成琉球本岛统一,建立第一尚氏王朝,三山时代至此终结。
- [15] “杜(もり)”指茂密的树林或山丘、圣地。首里城因坐落于被树林覆盖的山丘,故被称为“首里杜”。
- [16] 地名。位于冲绳县南部的岛尻郡志头村。

参考文献

- 王世舜. 尚书[M]. 王翠叶,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申叔舟. 海东诸国纪[M]//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 第一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 司马光. 资治通鉴: 第二十册卷204[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李昉等, 编. 太平御览: 卷915[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吴霭华. 十四至十九世纪琉球久米村人与琉球对外关系之研究[J].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 1991(6).
- 沈约. 宋书: 第三册卷28[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沈约, 注. 竹书纪年: 卷二(天一阁刊本)[M]. 影印本. 上海: 上海涵芬楼.
- 张廷玉, 等撰. 明史: 第一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张廷玉, 等撰. 明史: 第五册卷40[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张学礼. 使琉球记[M]//台湾文献丛刊: 第292种.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 1971.
- 陈侃. 使琉球录[M]//台湾文献丛刊: 第287种.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 1970.
- 郑秉哲, 蔡宏谟, 梁煌, 等. 球阳[M]//高津孝, 陈捷, 编. 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 第7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 郑秉哲. 琉球国旧记[M]//高津孝, 陈捷, 编. 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 第14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 周煌. 琉球国志略[M]. 陈占彪, 校.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224.
- 徐葆光. 中山传信录[M]. 台湾文献丛刊: 第306种.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 1972.
- 脱脱, 等撰. 宋史: 第九册卷40[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程顺则. 指南广义[M]//高津孝, 陈捷, 编. 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 第16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 蔡大鼎. 闽山游草[M]//高津孝, 陈捷, 编. 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 第28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 蔡温, 等. 中山世谱[M]//高津孝, 陈捷, 编. 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 第4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 魏征, 等撰. 隋书: 第一册卷11[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上里隆史. 海の王国・琉球: 「海域アジア」大交易時代の実像[M]. 沖縄: ボーダーインク, 2018.
- 戸部良熙. 大島筆記[M]. 琉球大学附属図書館蔵.
- 外間守善, 波照間永吉, 編. 定本琉球国由来記[M]. 東京: 角川書店, 1997.
- 外間守善. おもろ語辞書: 沖縄の古辞書混効験集[M]. 東京: 角川書店, 1972.
- 外間守善校注. おもろさうし: 下[M]. 東京: 岩波書店, 2000.
- 仲原善忠, 外間守善. おもろさうし辞典・総索引[M]. 2版. 東京: 角川書店, 1978.
- 伊波普猷, 東恩納寛惇, 横山重, 編. 琉球史料叢書: 第三 琉球国旧記[M]. 東京: 井上書房, 1962.
- 伊波普猷, 東恩納寛惇, 横山重, 編. 琉球史料叢書: 第五 中山世譜卷四[M]. 東京: 井上書房, 1962.
- 伊波普猷. 伊波普猷全集第六卷[M]. 東京: 平凡社, 1993: 110.

- 伊波普猷. 孤島苦の琉球史[M]//伊波普猷. 伊波普猷全集: 第二卷. 東京: 平凡社, 1974.
- 池谷望子, 等. 朝鮮王朝実録琉球史料集成: 原文篇[M]. 沖縄: 榕樹書林, 2005.
- 池宮正治. 『おもろさうし』にあらわれた異国と異域[J]. 日本東洋文化論集, 2003(9).
- 安里進, 等. 沖縄県の歴史[M]. 東京: 山川出版社, 2004.
- 那覇市企画部市史編集室, 編. 首里系家譜[M]//那覇市史資料篇: 第1巻7 家譜資料(三). 那覇: 那覇市企画部市史編集室, 1982.
- 赤嶺守. 琉球王国[M]. 東京: 講談社, 2004.
- 赤嶺誠紀. 大航海時代の琉球[M]. 那覇: 沖縄タイムス社, 1988.
- 佐敷町史編集委員会編. 佐敷町史: 2 民俗[M]. 沖縄: 佐敷町役場, 1984.
- 佐藤清. すらからの速御船[J]. 琉球の方言, 2002, 26.
- 沖縄県教育庁文化財課史料編集班, 編. 歴代宝案校訂本: 第二冊(活字本)[M]. 沖縄: 沖縄県教育委員会, 2023.
- 沖縄県教育庁文化課, 編. 辞令書等古文書調査報告書 沖縄県文化財調査報告書: 第18集[M]. 沖縄県教育委員会, 1979.
- 島村幸一, 小此木敏明, 屋良健一郎. 訳注琉球文学: 『佐銘川大主由来記』『周蘭両姓記事』『思出草』『浮繩雅文集』『雨夜物語』『永峰和文』[M]. 東京: 勉誠出版, 2022.
- 島村幸一. 琉球船漂着者の「聞書」世界: 『大島筆記』翻刻と研究[M]. 東京: 勉誠出版, 2020.
- 高良倉吉. 琉球の時代: 大いなる歴史像を求めて[M]. 東京: 筑摩書房, 2012.
- 高良倉吉. 琉球王国における拠点中枢機能の構造覚書[M]. 比嘉政夫, 編. 環中国海の民俗と文化: 第一巻 海洋文化論. 東京: 凱風社, 1993.
- 球陽研究会, 編. 沖縄文化史料集成: 5 球陽 原文編[M]. 東京: 角川書店, 1978.
- 豊見山和行. 冠船貿易からみた琉球王国末期の対清外交[J]. 日本東洋文化論集, 2000(6).
- 新屋敷幸繁. 新講沖縄一千年史[M]. 東京: 雄山閣, 1971.

作者简介: 刘丹 女 汉族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日语语言文化专业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琉关系史、琉球文学

联系方式: E-mail: 79537824@qq.com

The Representation of Sino-Ryukyuan Relations in the Ancient Ryukyuan Ballad Anthology Omorosōshi

LIU Dan

(Concord University Colleg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Omorosōshi, an ancient Ryukyuan ballad anthology compil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econd Shō Dynasty of Ryukyu, preserves folk ballads and court ritual songs from the 13th to the 17th century. By analyzing the ballads related to Sino-Ryukyuan exchanges in Omorosōshi, and combining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both China and Ryukyu, such as Mingshi, Chūzan Seifu, and Kyūyō,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narratives of enfeoffment and trade, the descriptions of junks and maritime rout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imagery and royal authority symbolism. It reveals that Omorosōshi, through the medium of ballads, not only preserves the historical memories of Sino-Ryukyuan interactions but also uncovers the profound subjectivity as a maritime kingdom.

Keywords: Omorosōshi; Sino-Ryukyuan Relations; Ryukyuan Ballads; Tributary System; Cultural Identity

(责任编辑: 王晨萌)